

清詩話

王夫之等撰

清 诗 话

(全二册)

王夫之等撰

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上海绍兴路5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商务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33.75 字数 662,000

1963年9月第1版 1978年9月新1版 1978年9月第1次印刷

统一书号: 10186·21 定价: 3.30元

519

再版說明

詩歌在我國燦爛的古代文化中占有相當重要的地位。隨着詩歌的興盛，對詩人及其作品進行評論的詩話著作也日益發展起來。到了清朝，詩話之作更是諸家紛起，蔚為大觀。而且日趨系統化、理論化。

近人丁福保所彙輯的《清詩話》是規模較大的一部詩話叢書。它收集了較豐富的清代詩話著作，有一定的參考價值。考慮到專業工作者和大學文科師生研究我國古代詩歌創作及有關評論的需要，這次我們把原中華書局上海編輯所一九六三年的版本稍加修訂，并請郭紹虞同志將前言作了較大的修訂補充，予以重版。

前言

郭紹虞

詩話之體，顧名思義，應當是一種有關詩的理論的著作。溯其淵源所自，可以遠推到鍾嶸的詩品，甚至推到詩三百篇或孔孟論詩的片言隻語。但是嚴格地講，又只能以歐陽修的六一詩話爲最早的著作。

歐陽修的著作，由於是創體，所以只題詩話，其稱六一詩話或歐陽文忠公詩話者，乃是後人爲了詩話日多，恐怕混淆，才加上專名以資區別的。稍後，司馬光仿其體，續有所作，即稱爲續詩話，其稱溫公續詩話者，也是後人加上去的。從這樣講，詩話體製的定型，不妨說是從歐陽修開始。

歐陽修自題其詩話云：『居士退居汝陰而集以資閑談也。』可見他的寫作態度是並不嚴肅的。假使說鍾嶸詩品是文學批評中嚴肅的著作，那麼歐陽修的詩話，只是一種輕鬆的隨筆罷了。輕鬆隨便也不一定是壞事，但態度不嚴肅，却容易滋生很多流弊。章學誠文史通義·詩話篇就對這一流的詩話，加以極嚴厲的批評。他說：

論文考藝，淵源流別不易知也；好名之習，作詩話以黨同伐異，則盡人可能也。以不能名家之學，入趨風好名之習，挾人盡可能之筆，著惟意所欲之言，可憂也，可危也。

他的話，在當時是有所指的，但詩話本身，確也有如章氏所說這些根本性的缺點。那麼歐陽修爲什麼要創這種體裁呢？爲什麼這種體裁一行，又能吸引很多人踵而效之呢？這也不是沒有原因的。

後人每說唐人不言詩而詩盛，宋人言詩而詩衰。其實不然。唐人不是不言詩，而歐陽修的詩話，正是在唐人論詩著作上提高一步的。唐人論詩之著，其單篇零札，收入集中的，不論是總集或別集都是比較高明的。即司空圖的二十四詩品也不是單行別出的著作。其單行別出者不外二種：一是受當時隨筆式的小說之影響，如孟榮本事詩等，雖可說源本小序，但畢竟只供茶餘酒後的談資。另一種則是詩格詩例一類論作詩法的初學入門書。其中固然也有一些精義，但大都是繼承齊、梁以來的論詩風氣，或迎合當時科場的實際應用，所以只重在藝術技巧上的考究，並不能看出當時詩論的主要傾向。

歐陽修的詩話，雖同樣也取隨筆形式，但不限於論詩及事，那就比本事詩等提高了一步。即論詩及辭，也比詩格詩例一類之著為高。由形式言，則『惟意所欲』，『人盡可能』，似為論詩開了個方便法門；而由內容言，則在輕鬆平凡的形式中正可看出作者的學殖與見解，那麼可淺可深，又何嘗不可以名家呢？（我們看到說詩牙慧是潘德輿養一齋詩話的前身，那就可知他的著作態度也是十分嚴肅的。不僅如此，即歐陽修的詩話，好似信筆雜書，但也不是輕易隨便的。據張邦基墨莊漫錄卷八稱『歐陽文忠公有雜書一卷，不載於集中，凡九事』，其實這正是六一詩話的前身。其中有好幾條都見今本六一詩話中。可知即是隨筆式的著作，也不是率爾操觚的。這是詩話之體所以流行不廢的原因。

然而，作者既多，總不免於濫，於是詩話叢書就在這方面起了一些去蕪存菁的作用。不過，這作用還是很微弱的。其原因：一由於選輯的宗旨不盡相同，有的為了保存罕見之本，有的為了流傳名家之作，那就不一定與詩學理論有關係。二由於時代的風氣和個人的興趣不能相同，於是即使重在詩學理

論，而取舍標準也可能不一致。因此，所謂去蕪存菁，也只能就其大概而言，不可能完全符合現時代的要求。

丁福保所彙輯的幾種詩話，從現代標準看，不能說一無缺點，但作為參考資料，還是有一定價值的。他彙輯的詩話叢書有三種：一是翻印何文煥彙刻的歷代詩話，此書在以前的詩話叢書中也是比較好的。其餘他自編的有歷代詩話續編及清詩話二種。這三部書可說是規模較大的詩話叢書。因此，在學術界也起過一定的影響。但由於他在很大程度上存在牟利性質而急於成書，故其自編二種詩話所據版本往往不加選擇，校勘亦多疏漏，在清詩話中尤為明顯，這些我們下面將分別論述。

尤其重要的，他既以『清詩話』為名，至少應注意兩點：一、能在所選的詩話中反映清代的學術風氣；二、所選的是清人詩話中的代表作品。這兩方面，丁氏也未嘗不注意到，但總覺不夠。這原因，可能由於他急於成書，未及多方蒐羅；也可能由於他只求品種之多，於是有些繁重的著作也就只能放棄了。他收翁方綱的小石帆亭著錄而不收石洲詩話，可能就是這個原因。

我覺得北宋詩話，還可說是『以資閑談』為主，但至末期，如葉夢得的石林詩話已有偏重理論的傾向。到了南宋，這種傾向尤為明顯，如張戒的歲寒堂詩話，姜夔的白石道人詩說和嚴羽的滄浪詩話等，都是論述他個人的詩學見解，以論辭為主而不是以論事為主。從這一方發展，所以到了明代，如徐禎卿的談藝錄，王世貞的藝苑卮言，胡應麟的詩數等，就不是『以資閑談』的小品，而成為論文談藝的嚴肅著作了。一到清代，由於受當時學風的影響，遂使清詩話的特點，更重在系統性、專門性和正確性，

比以前各時代的詩話，可說更廣更深，而成就也更高。儘管清詩話中不免仍有一些濫的作品，只能看作『以資閑談』的作品，但就一般發展的總傾向而言，清詩話的成就可說是超越以前任何時代的。

可能有人認為：清詩話中隨筆式的『以資閑談』的著作，其數量也並不太少。即就丁氏所輯而言，如梅村詩話、寒廳詩話、漁洋詩話、山靜居詩話、消寒詩話，以及履園譚詩中『以詩存人』、『以人存詩』及『記存』各條都是這樣。此外，為丁氏所未輯者，如毛奇齡西河詩話、袁枚隨園詩話、郭麐靈芬館詩話、袁潔蠡莊詩話、張曰斑尊西詩話、徐熊飛春雪亭詩話、陶元藻壘亭詩話、沈濤匏廬詩話、俞儼生香詩話、馬星翼東泉詩話、徐經雅歌堂詩話、喻文鑒考田詩話、潘煥龍臥園詩話、姚椿樗枏寮詩話、嚴廷中藥欄詩話、張晉本達觀堂詩話、呂善報六紅詩話、姚錫範紅葉山房詩話、李家瑞停雲閣詩話、陳來泰壽松堂詩話等等，或則小部分濫，或則大部分濫，或多或少都屬於這一類型的著作。同光以後，這類著作似乎更盛一些，怎能說是超越以前任何時代呢？

其實不然，我們說的是總的傾向，當然不可能沒有例外，不過這些例外，是不能代表當時的成就的。而且，論詩之著不外二種體製：一種本於鍾嶸詩品，一種本於歐陽修六一詩話，即溯其源，也不出此二種。其界於二者之間的，只能說是歐派的支流；至於專論詩格詩例或聲調等問題的，又可說是鍾派的支流。大抵這兩派，詩品偏於理論批評，比較嚴肅；六一詩話偏於論事，不成系統，比較輕鬆，二者區別，從表面看，只是寫作態度的不同而已。嚴肅的偏於理論，輕鬆的偏於批評或敘述。偏於理論的必須條理精密，系統分明，故能嚴肅。偏於批評或敘述的，不妨隨所觸發，信筆即書，故較輕鬆而易

涉於濫。再有，嚴肅的重在論辭，輕鬆的則於論辭之外不妨再兼論事。重在論辭的往往偏於論古；論古則已有定評，不易信口雌黃，態度也較嚴肅。重在論事的往往偏於述今；述今則標準可以降低，不妨泛濫一些。詩品代表了前一種，六一詩話代表了後一種，所以在六一詩話以後，有偏於嚴肅的詩學理論的傾向，正是這種詩話體發展的必然趨勢；而一般停留於隨筆式的『以資閑談』的著作反成為落後的了。論詩之著必須有輕鬆一體，才能成為廣大教主，使論詩的方面廣，又能成為方便法門，使論詩的著作多。但是，廣則易雜，多則易濫，假使停留在這個階段，又將使論詩之著泛濫無歸，蕪而不精了。所以詩話之從論事到論辭，從宗歐到宗鍾，從輕鬆到嚴肅，是詩話本身發展的主要傾向。

為什麼可以這樣說呢？因為（一）歐陽修的論詩，態度也是嚴肅的，並不是故意要使論詩之著只是『以資閑談』的。從唐代以來，嚴肅的詩論早已成為單篇化了。歐陽修也不能例外，他的一些嚴肅的詩學理論，大都寫在文集或詩集之內，至于詩話一體，只是他論詩的緒餘而已。由於是緒餘，不妨成為『以資閑談』的作品。後人則不然，專心盡力以為詩話，就不能這樣，至少不能完全是這樣。於是必須要有些精湛的獨到的意見，必須要使蕪雜的成為系統化，成為專門化，所以這是詩話之體發展的必然規律。（二）在嚴肅的已有高度成就基礎上再行提高是比較困難的。所以詩品以後，一時不易有嗣響，而唐人的本事詩和詩格詩例一類著作，反顯得成為倒退了。其實，在唐詩發展的基礎上，詩學理論必然相應發展，不會中斷的。只由於唐人把它單篇化了，再把批評意見散見在選集中了，從完整的理論一變而為零星瑣屑的意見，於是一般人也就不易看出唐人詩論的重要性了。詩話之體正是在這種從完整到分

散的趨勢中產生出來的，所以一般人總覺得六一詩話要比詩品遜色一些，而不知此後詩話之演變趨勢，正是要求再從分散到完整，從零亂到系統，從輕鬆到嚴肅，從『不能名家』到名家，從『人盡可能』到不是人盡可能的。在六一詩話的基礎上提高，比在詩品的基礎上提高要容易得多。因此，一般人也就不只看到詩話體的進步發展，而看不到在詩品基礎上的進步發展。於是對於葉燮原詩這樣一種體系完整，總結以前詩學理論的著作，不看作是鍾嶸詩品的繼承發展，只看作是清詩話的特出成就了。把這類作品也算到詩話的賬上，當然清詩話的成就更要超過以前任何時代了。

從廣義說，葉燮原詩一類的著作是可以列入詩話範圍之內的。即從狹義講，清詩話中繼承六一詩話遺風的，也有特出的成就，即就上舉有部分較濫的作品而言，也有精義可採，突過前人之處。此外，如李調元的雨村詩話，有論古論今二種，康發祥的伯山詩話，以前集論古人，以後集論清代人，這樣區分已使詩話成為專門化，不能說是『入趨風好名之習，著惟意所欲之言』了。不僅如此，其論古者或以代分，如王士禛的五代詩話以時為限，翁方綱的石洲詩話以時為序，而朱彝尊的靜志居詩話則專論明詩，吳景旭的歷代詩話又總論前朝。或以人分，如趙翼的甌北詩話於李白、杜甫、韓愈、白居易、蘇軾、陸游、元好問、高啓、吳偉業、查慎行十家詩各為一卷，而潘德輿也有李杜詩話，繆煥章雲樵外史詩話也有一卷專論查詩。或以體分，如方東樹昭昧齋言之分體論詩，而輔以以代分以人分二種，使條理更清楚。這都是由於專門化後使詩論更精闢的例證。至趙翼甌北詩話中有陸放翁年譜一卷，則更是清代學風在詩話中的反映了。即使詩話中雜論古今之作，也有專門化的傾向。如鄭方坤的全閩詩話專論

閩詩，陶元藻的全浙詩話專論浙詩，這是論地方詩的較大著作。他如南浦詩話，海虞詩話，菱溪詩話，雁蕩詩話，三山詩話，西江詩話，澈浦詩話以及楚天樵語，昭陽述舊編，滇南草堂詩話等更是多得不可勝舉。那麼詩話而通於方志，更是專門的著作了。又如林昌彝之射鷹樓詩話專論鴉片戰役之作，沈善寶之名媛詩話，梁章鉅之閩川閩秀詩話，專論婦女之作，則詩話而通於史傳，也成為專門著作了。這些雖與理論無關，然而態度嚴肅，決非只以『以資閑談』為目的了。這是清詩話的特點之一。

何況，即使其它論古述今雜糅之作，有的旨在表微，如鍾駿聲的養自然齋詩話，有的意在評騭，如洪亮吉北江詩話，潘德輿養一齋詩話，黃培芳香石詩話等，也都比以前同一類型的詩話要高一些。此外，或學贍而考覈，如蔣超伯通齋詩話之偏於考據，或語鍊而意深，如劉熙載藝概中之詩概。或輯舊聞，如昭昧齋言之附錄諸家詩話，而張燮承的小滄浪詩話與許印芳的詩法萃編則更是專輯昔人理論的著作。或研聲律，如許印芳詩譜詳說，吳紹燦聲調譜說，董文煥聲調四譜圖說等，又均在丁氏所收的趙執信諸家之上。至於述例法，摘句圖，作疏解，論源流等等，也各有成就，這都是清代學風在詩話方面的反映，成為清詩話在各方面成就的不同特點。所以可說清詩話的成就是超越以前的任何時代的。可惜丁氏所收還不很突出這種特點，必須再輯補編或續編，然後才能使清詩話的全貌完全顯現出來。

再由於丁氏印書，志在流通，不重在學術的介紹，所以在各種詩話後多無序跋，即有也寥寥數語，並不重要。現在中華書局上海編輯所整理重印清詩話，我爲了彌補丁氏這個缺點，因按照原來次序，每一種作些提要式的介紹，但對於批判方面還覺做得不够。至最後附輯的揮麈詩話，以非清人著述，

此次重印亦已刪去，故置不論。

姜齋詩話 二卷。王夫之撰。夫之（一六一九——一六九二）字而農，號薑齋，晚居湘西石船山，學者稱船山先生。其著作有後人編集的船山遺書。案船山遺書中無薑齋詩話之目。王氏論詩之著，有詩繹一卷、夕堂永日緒論·內篇一卷及南窗漫錄一卷。夕堂永日緒論分內外二篇，內篇論詩，外篇論時文。清光緒間，王啓原輯談藝珠叢，已把它割裂，只取內篇而去其外篇。所以談藝珠叢中，除詩繹一卷外，夕堂永日緒論只有一卷。丁氏所據，當即談藝珠叢本，不過他把這兩種合而為一，又易稱為薑齋詩話而已。現在人民文學出版社校印的也稱薑齋詩話，但不是丁氏之舊。此本從船山遺書中再補輯南窗瑣記一卷，合成三卷，且於夕堂永日緒論又全部錄入，並不刪除外編。假使要看王氏文藝思想的全貌，固以人民文學出版社本為較完備。但王氏於古詩評選、唐詩評選及明詩評選這些書中也有論詩之語，如果一併輯入，那就更完備了。王氏於明亡後遜迹深山，始終未薙髮，表現了堅卓的民族氣節。其學術思想又發展了我國傳統的接近唯物主義的理論，故論詩也以意為主，重在興觀羣怨，反對雕琢擬古。

答萬季野詩問 一卷。吳喬撰。喬，又名爰，字修齡，江蘇崑山人。所著詩名舒拂集。萬季野名斯同，號石園，浙江鄞縣人。考吳氏所著，有圍爐詩話六卷，其中亦多答問之語。此卷答萬季野詩問中語，亦在其內，但不寫明答萬季野問。疑圍爐詩話較後出，此卷則是最初部分寫定之稿。趙執信談龍錄

謂『崑山吳修齡論詩甚精，所著圍爐詩話，余三客吳門，徧求之不可得，獨見其與友人書一篇』。他所說的與友人書，即指這一卷。談龍錄中所稱引吳氏之語，都在此卷中。我想此篇在當時並未刊行，只是相互傳錄。清嘉慶間，雪北山樵輯花薰閣詩述，以此篇附在卷三談龍錄後，題與萬季野書，亦未別成一卷。丁氏據此，改易今名，於是成爲一種單本書籍了。大抵丁氏當時尙未見到適園叢書本之圍爐詩話，故以此篇列爲清詩話中之一種，實則此只是散篇文章，不得以著述視之。吳氏論詩與馮班、賀裳最相合，嘗自謂賀黃公載酒園詩話、馮定遠鈍吟雜錄及某圍爐詩話可稱談詩之三絕。其自負至此。此卷雖只是吳氏詩論的一鱗一爪，但窺豹一斑，也可知其大體，可與圍爐詩話同參閱之。

鈍吟雜錄 一卷。馮班著。班字定遠，號鈍吟，江蘇常熟人，與兄舒齋名，號二馮。所著有鈍吟文稿、鈍吟樂府及鈍吟雜錄諸書。案鈍吟雜錄凡十卷，其中如家誠二卷、遺言一卷、將死之鳴一卷，多涉歷世故之言；通鑑綱目糾謬一卷，及日記、誠子帖各一卷，也不是論詩之語。其足當吳喬所謂談詩一絕者，當指書中嚴氏糾謬一卷，才與吳喬論詩宗旨相合。至丁氏清詩話所舉之鈍吟雜錄則是根據雪北山樵所輯花薰閣詩述之本。雪北山樵既輯錢木菴唐音審體，於是再從馮氏鈍吟文稿及鈍吟雜錄、江俗篇中選其有關樂府之論，以備參考，故所選僅六則，但也稱爲鈍吟雜錄。丁氏不察，一仍其舊，並據花薰閣詩述本題爲『馮定遠原本』，則似乎馮班之鈍吟雜錄原來就是這樣的了。

江西詩社宗派圖 一卷。張泰來撰。泰來字扶長，江西新建籍，豐城人。康熙庚戌（一六七〇）進士，官金鄉知縣，吏部主事，外轉廣東兵備道。此書據其自序，謂由宋堦撫吳時曾以江西詩派論命題課

士，時張氏致政家居，有人以此往問，因據王應麟小學紺珠所定二十五人，各爲立一小傳，編次成帙。至胡仔荅溪漁隱叢話及豫章志所舉，有與小學紺珠不同者，如何顓、何顓諸人則均不爲立傳，所以這是史料性的著作。但就史料而言，劉克莊江西詩派小序，郭子章豫章詩話均爲研究江西詩派的重要資料，似乎張氏都未見此。所以劉克莊文中提到黃山谷，而張氏不爲山谷立傳；而比張氏稍後，查慎行的得樹樓雜鈔中就據豫章詩話考得江西詩人十七家集名，也爲張氏所未舉。此外如王直方詩話、艇齋詩話等書中也有些材料可輯，張氏亦均未提及。所以張氏所錄尙多可以補充之處。張宗泰魯巖所學集卷十一，有跋江西詩社宗派圖錄一文，多補正是錄缺失之處，即對宋樂夢曉樓隨筆所言多異議，可以參閱。王士禛蠶尾文卷八有跋江西宗派圖四則，亦可參閱。（宋顧樂夢曉樓隨筆所言多襲王氏說。）又案張氏此書有昭代叢書本及知不足齋叢書本二種。昭代本有附錄，并有楊復吉跋，今清詩話本無之，知其所據，乃知不足齋所印厲鶚校本。

梅村詩話 一卷。吳偉業撰。偉業（一六〇九——一六七二）字駿公，號梅村，江蘇太倉人。明崇禎進士，官右庶子，弘光朝任少詹事，入清後，官國子祭酒。此卷有婁東雜著本及觀自得齋叢書本，亦見梅村家藏稿及吳梅村先生編年詩集中。各本相校，無大出入。清詩話本殆據婁東雜著本。吳氏長於詩，尤工七律和七言歌行，但詩話多記述故事，而於理論較少闡發，即其文集中亦少論詩之語，殆所謂「善易者不言易」。

寒厅詩話 一卷。顧嗣立撰。嗣立（一六六五——一七二二）字俠君，號聞邱，江蘇長洲人。此書據昭

代叢書壬集補編印行。昭代本作一卷，此本亦然。但嗣立曾孫達尊跋謂『今春偶理舊篋，得寒廳詩話二卷，首尾完全』云云，而此後張士元寒廳詩話序亦言：『書僅二卷，而辨義法，載文獻，備遺事，前輩之緒言頗有存者，可喜也。』則是原爲二卷，或昭代本合而爲一，丁氏不察，一仍其舊，亦未可知。

茗香詩論 一卷。宋大樽撰。大樽字左彝，一字茗香，浙江仁和人。乾隆丁酉（一七七六）舉人，官國子助教。著有學古集，此卷即附刊集中。其別出單行者則有知不足齋本，丁氏所據即此。遜敏堂叢書

本只作詩論一卷，疑原題如此。宋氏論詩，完全本於以前封建社會之傳統觀點，其立論或失之腐，或失之玄。林昌彝射鷹樓詩話卷六、陳衍石遺室詩話卷三，雖大體推崇其說，然亦有不盡贊同之處。

律詩定體 一卷。王士禛撰。士禛（一六三四——一七一）字子真，一字貽上，號阮亭，又號漁洋山人，山東新城人。順治進士，官至刑部尚書，諡文簡。其論詩雖主神韻，但很重視音節與格律。此

卷雖僅數頁，但論近體律詩，能概括地說明唐人律格，以破除流俗『一三五不論』之說，甚有見地。然

證記聞亦引王氏語，謂『律句只要辨一三五』，此卷可看作這句話的具體說明。此後，李郁文之律詩

四辨與日人谷立應之全唐聲律論，雖例證更多，要其大旨，未能外於王氏之說。王氏謂：『五律，凡雙

句二四應平仄者，第一字必用平，斷不可雜以仄聲，以平平止有二字相連，不可令單也。其二四應仄

平者，第一字平仄皆可用，以仄仄仄三字相連，換以平字無妨也。大抵仄可換平，平斷不可換仄。』此

言甚有至理，頗合漢語詩律中二音步的規律。至丁氏跋記謂『覓得新城王氏家塾舊抄本』，則欺人之

談。如丁氏所得真是舊抄本，則雖非欺人，實是丁氏受人之欺。此卷僅寥寥數頁，流俗傳抄，自屬可

能。累經傳抄，此後再展轉翻刻，當然魯魚亥豕在所不免。大抵此卷刊本最早者爲清嘉慶間雪北山樵所輯花薰閣詩述。詩述中有漁洋答問一卷已收此書，亦言得自新城王氏家塾傳抄本。此後，同光間王懿榮所刊天壤閣叢書，內有聲調譜彙刊一種（俗稱聲調三譜）亦收此書。光緒中，徐士愷所輯觀自得齋叢書，殆即據此。這兩種錯誤較多，所以丁氏稱之爲俗本。其出花薰閣詩述本者，疑只有光緒五年上海淞隱閣排印之國朝名人著述叢編本。在當時，花薰閣詩述比較難得，丁氏得此，以與各本相校，當然可說『與俗本迥異』，但因此便說『覺得新城王氏家塾舊抄本』，則不符事實。清詩話中根據花薰閣詩述本者就有好幾種，如答萬季野詩問、鈍吟雜錄、然鐙記聞、師友詩傳錄、唐音審體諸書皆是。丁氏於鈍吟雜錄及唐音審體二書皆錄雪樵題語，而此本刪之不錄，亦近掩耳盜鈴之迹。不僅如此，花薰閣本於五言仄起不入韻一首詩注，謂『注乃單拗雙拗之法』，此注字據天壤閣本似是『此』字，當以『此』字爲正。而丁氏亦仍花薰閣本之訛，未予校正。可知各本都自傳抄得來，互有優劣，不必定以某一本爲絕對的是。

然鐙記聞 一卷。王士禛口授，何世璠述。世璠（一六六六——一七二九）字澹菴，一字坦園，號鐵山，山東新城人。康熙四十八年（一七〇九）進士，官至吏部侍郎，署直隸總督，諡端簡。此書爲王氏談藝的一部分，與郎廷槐、劉大勳二人詩問相近，故花薰閣詩述本即以之與郎、劉二人所述合輯，列爲漁洋詩問之四。王氏論詩偏重神韻，此卷多論風致，可看出風致與神韻之關係，也可看出他選三昧集的旨趣。不過由於他強調過甚，甚至謂七言律不可學歐、蘇、黃三家，則不免太過，所以許印芳

詩法萃編本跋，謂此種意見，只能看作他一家之說。此卷有花薰閣詩述本、天壤閣叢書、聲調譜彙刊、談藝珠叢本、觀自得齋叢書本及詩法萃編本，古今說部叢書本。清詩話所據，當與律詩定體相同，並爲花薰閣詩述本。觀各本于此卷第一條均作：

學詩須有根柢，如三百篇、楚詞、漢魏，細細熟玩，脫盡時人面孔，方可入古。

惟花薰閣本析爲兩條：於『細細熟玩』之後，逕接『方可入古』，爲第一條，而以『脫盡時人面孔，方可入古』，爲第二條。（詩法萃編本亦分兩條，惟第一條『入古』作『入門』，疑出許氏校改。）今清詩話本與花薰閣本完全相同，故知其所據爲花薰閣本。

師友詩傳錄 一卷。即廷槐編。廷槐，字梅谿，盛京廣寧人。廷槐學詩於王士禛，述其師說，並兼採張篤慶、張實居二人之言，故每一問而三答。篤慶字歷友，平原人；實居字蕭亭，鄒平人，二人與士禛都有親戚關係。漁洋詩話曾稱歷友詩淹雅華瞻，蕭亭詩亦由士禛爲之選定。故三人之論旨也比較接近。案此書內容與名稱，各本不一。有稱爲漁洋定論者，則專錄士禛之語，刪去二張之說。有稱爲梅谿詩問者，則爲二卷本，上卷與各本相同，凡十九條，下卷爲諸本所無。此卷並非一問三答，大都爲士禛之語，惟二條有蕭亭答，故雪北山樵以之輯入花薰閣詩述中時，謂『口煩微別……未敢臆斷』，稍存懷疑之意。亦有稱師友詩傳錄者，大都爲不足本。如學海類編本、談藝珠叢本、詩法萃編本、國朝名人著述叢編本皆祇十九條，與清詩話本不同。故知清詩話本即據花薰閣詩述之梅谿詩問，不過易其名稱，仍題師友詩傳錄而已。

師友詩傳續錄 一卷。劉大勳編。大勳字仔臣，長山人。此爲劉氏記述王士禛答問之語，故亦稱古夫于

亭詩問，古夫于即士禛所居之亭。又因郎廷槐先有師友詩傳錄之輯，故此卷亦稱師友詩傳續錄。但郎錄一問三答，兼採二張之說，續錄則僅述士禛一家之言。師友詩傳錄之稱梅谿詩問者較少，而師友詩傳續錄之稱古夫于亭詩問者則較多，如詩觸叢書本、詩法萃編本等皆然。此書內容亦有全有缺。談藝珠叢本、國朝名人著述叢編本皆僅四十問，與經香閣、連雲閣二本同，皆不全。丁氏所輯，於郎錄則取花薰閣詩述本兼採次卷，於劉錄則取六十二問之足本，亦是一個優點。

漁洋詩話 三卷。王士禛撰。士禛論詩之語甚多，雜見於池北偶談、居易錄等筆記中。其經後人纂輯成書者，有諸聲別部（同治間三餘書屋重刊本易稱分類詩話）、帶經堂詩話二種，可窺王氏詩論之全。其以漁洋詩話名者有二種：一爲檀几叢書本，僅一卷，仍摘取其五言詩七言詩凡例，題爲詩話，實非詩話性質。另一種即此書，爲其晚年所作。大都記述生平經歷與其兄弟友朋論詩諧談之語，所標舉者亦多流連山水點染風景之作，並不重在理論，但在具體事例中也可約略窺其論詩宗旨。此書有兪兆晟序及自序，惟乾隆戊寅竹西書屋重刊本有黃叔琳序。上海會文堂石印史夢溪評點漁洋詩話，亦有黃叔琳序，知史氏所據，即竹西書屋本。夢溪名承豫，字衍存，宜興人。評語雖不多，間有可取處。張宗泰魯巖所學集卷十五于此書三卷，各有書後一篇論其疎失，可參閱。案四庫總目提要亦稱士禛疎于考證，或由于此爲士禛晚年之作，漫不經意，故多可議之處。此書有王漁洋遺書本、詩觸叢書本，皆三卷。惟掃葉山房石印本分爲二卷。此本錯誤最多，不足取。